

■ 宁波普高高质量发展系列评论⑥

普通高中必须向高考要质量



郑东辉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已成为社会各界共识,办人民满意的普通高中,绕不过高考这个弯,因为人民群众对高考充满无限期待。既然如此,普通高中就要勇往直前地做好高考这篇大文章,而不是顾左右而言他。

那么,是不是只盯着高考分数呢?从新高考的“科学选才”初心来看,意在运用多种方式选出不同类型的人才进入各个层次的大学,所要考查的是学生核心素养是否达到大学与社会的要求。也就是说,普通

高中要在育人上下功夫,而不是在育“分”上走极端。当然,育人不是不要分数,而是通过并借助高考将分数落实到人才质量上。

对于人才质量,不同类型与层次的普通高中所要达到的规格,应该与生源质量相匹配。一方面,每所学校基于校情与学情,设定人才培养目标,开发学生的潜能,使之成为最优的自己。另一方面,校际之间的人才质量应该趋于平衡,即质量相当的生源进入水平相当的学校,通过高考的洗礼,进入同批次大学的人数及其比例应该是差不多的。这也是学生家长对孩子成才最朴素的诉求。

如此诉求,要通过提升学校的课程、教学、教师与管理质量来实现。课程天生是为儿童服务的,关键是如何围绕人才质量规格,对2020年修订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进行校本化处理,开发出适应新高考的课程门类与内容来,比如怎样充分利用14个学分的校本课程为学生选科和兴趣发展服务。

高质量的课程,离不开有效教学。教学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所教的课程内容是否真正转化为学生所知、所能、所会,关注学习的达成度。当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成为一种常态,比如为深度学习而教,为学生设计校本分层作业,运用人工

智能服务学生学习,基于学业质量标准进行学习评价,教学质量就有了保障。

课程也好,教学也罢,教师是关键力量。靠一个个名师成就教师质量似乎已不可取,由一个个名师引领的教研团队促进教师发展才是王道。教研文化建设也就成为学校的必修课,从教而不研走向教研相济,从合而不作走向分工合作,从经验分享走向知识共享,从坐而论道走向起而行道。

上述这些质量的提升,均需管理保障,管理不到位,则会事倍功半。新高考新课程新教学管理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好学生需求与分班、选科、走班的关系,学生入学之初一次性分好不同层次的班,还是在过程中通过评价逐步调整,让学生任意选科组合,还是基于大学的专业要求提供必要的组合让学生有限选科,只有选科后才走班,还是全面推进分科分层走班,这些问题都要立足绝大多数学生取胜高考的大视野来思考,而不只是为了拔尖。校长作为管理的首席,从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如果校长能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执念去经营学校,把教育当事业做,把课程当专业做,把领导当服务做,“管理出成效”也就有了可能。

当普通高中肩负起高考育才的社会责任,五质(量)并举,多管齐下,才能赢得高考,回应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



投稿
邮箱

jinbaopinjun2012@126.com

不吐不快

教师减负需要“清单” 更需要“说不”的权力

临近岁末,一纸重磅文件让湖南的中小学教师们松了一口气。近日,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清单15条,剑指中小学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11月23日《潇湘晨报》)

出台“减负清单”,就是把涉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各种强加于一线教师的过重负担进行削减,重点清理针对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严格控制总量和频次,确保相关事项在现有基础上减少50%以上。

按照“减负清单”要求,该省还明确规定:“如中小学课程已有类似内容,可根据实际需要合理融入教学安排,不准重复安排。”很明显,如果“减负清单”落实到位,一线中小学教师身上额外的工作负担将大大减轻甚至取消,不管是对教师个人,还是对于教育教学管理,都不啻是一个福音。

一线教师的主要职责就是教书育人,坚守和回归课堂也是教师履行上述使命与责任的根本基础和前提。但现实中,很多一线教师除了要完成上述任务之外,还面临着诸多额外压力与负担,比如各类繁琐的报表、统计,各部门组织的活动和各类“进校园入课堂”工作任务落实,各种拍照留痕、台账记录、工作笔记、上传场景甚至是订阅APP等有明确考核检查指标的临时工作等,不少教师手忙脚乱,不仅需要贴上课余时间,甚至一些临时性应景性任务还会让教师不得不暂停和中断教书育人工作来疲于应付。这些现象和行为,不仅容易导致一线教师分散精力、远离课堂,一些应景检查考核的表面文章,更涉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教育系统魅影重现,不仅会



漫画 王铎

导致一线教师偏离主业主责,更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管理成效和质量提升。从这些角度而言,专门出台“减负清单”,对于减轻学校和教师额外过重负担进而回归课堂并腾出主要精力抓好教育教学而言,确实意义深远而积极。

“减负清单”意义积极,成效可期,但要想真正落实到位,除了全面落实“清单”要求,彻底纠正加重基层教师负担的行为之外,还要赋予一线教师“说不”的权力。也就是一线教师能对不属于主业主责的各种额外负担,有拒绝的底气和相关制度支撑。

现实中,一线教师面临的各种额外负担,大部分来源于上级有关部门以及自上而下的层层加码要求。在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中,身处基层的一线教师只能陷入被动接受的尴尬。在这样的情形下,恐怕即便有“减负清单”也是形同虚设,谁会冒着违背上级要求的风险去拒绝不合适和强加于教师的各项任务要求呢?同时,对于各类下达的考核任务要求而言,很多都不会简单地冠名形式主义和官僚

主义的名目出现,一些工作任务还会打着为了孩子和推动教育健康发展的名堂而来,这些工作任务和要求是不是额外负担和违背“减负清单”要求,恐怕只有置身事中的当事人和任务指向人一线教师才最有发言权。因此,如果一线教师没有能“说不”的拒绝权力,意义再积极的“减负清单”也会流于无形。

要想让“减负清单”落到实处,真正成为一线学校和教师减负的屏障,除了不折不扣执行到位之外,还要让一线教师对额外工作任务有“说不”的权力,有关部门可以配合“减负清单”的实施,建立教师过重负担公开举报投诉机制,并定期对教师负担落实情况开展调查研究,专门听取一线教师的意见建议,还可以采取每年评选加重教师工作负担案例等方式,让教师能真正地对减轻负担有话说,能说话,能评价,这样才能真正减轻一线教师的不合理负担,让其真正投入和聚焦教书育人的主业主责。

许朝军(禹州市教体局)